



回首人生①

传记文学
柳 萌 编

回首人生①

传记文学

柳 萌 编

25
6744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回首人生①HUI SHOU REN SHENG

柳 萌 编

责任编辑：刘明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70 000字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5 000册	定价：6.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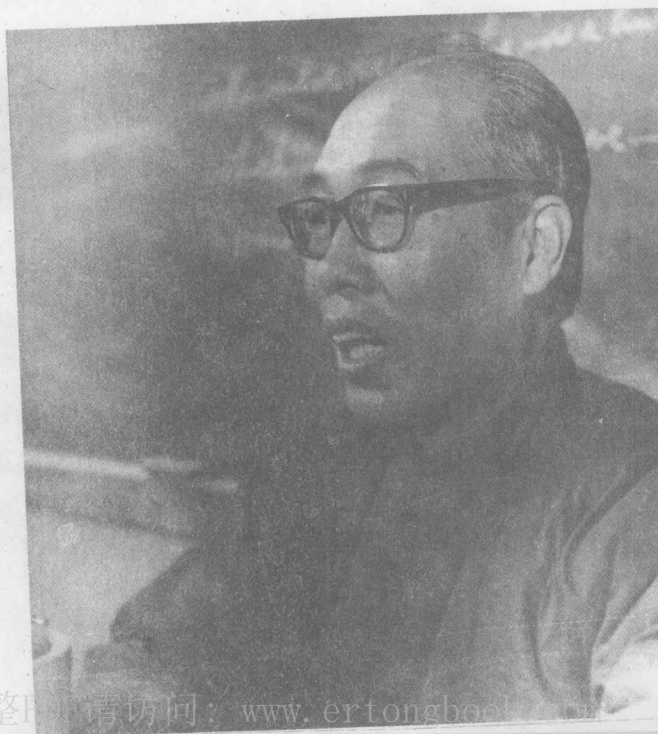
△《一个女名人的梦》一文的主人公朱明英演出剧照。

◁上文作者胡思升。

◁ 《“裸野”
和它的主人》
一文的作者
李世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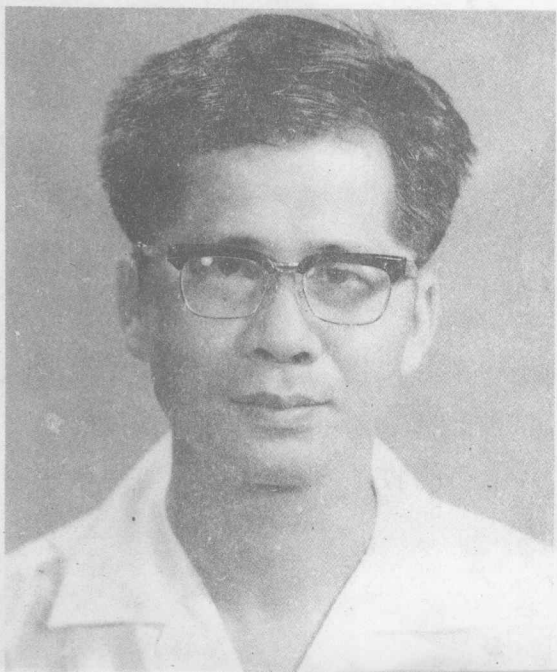
▷ 上文主人公
鲁碧近照。会
六国语的牧羊
人。





△《来自炼狱的朝圣者》一文的作者、主人公、著名诗人梁南在朝鲜金刚山顶。

▷《第十八个和走进门槛的少女》一文的作者、主人公，著名散文作家杨羽仪。



目 录

来自炼狱的朝圣者.....梁南（1）

- 一 “浮” 不起来的朝圣者
- 二 饥饿·人与人和自然
- 三 夜宿原始森林始末（上）
- 四 夜宿原始森林始末（下）
- 五 离拓荒地到“桃源”（上）
- 六 离拓荒地到“桃源”（下）
- 七 险象丛生的婚姻
- 八 从炼狱到地狱
- 九 铁路力工十五年
- 十 中国的吉普赛人

一个女名人的梦.....胡思升 际平（74）

第一章 夹缝中的苦斗

- 一 一颗刚刚升起的新星
- 二 成功者的笑
- 三 她不相信眼泪
- 四 一束微弱的光亮
- 五 黑非洲之声
- 六 第一次小小的轰动
- 七 太早的高兴和绝妙的建议
- 八 偏见的幽灵和迟到的伯乐

第二章 仙曲风飘处处闻

- 九 一支歌曲救了一条少女命

十 蒙博托的鼓掌和中国的阿贝蒂

十一 阿拉伯世界的沸腾

十二 一块“新大陆”和部长先生的执著

十三 出国的风波和巴黎的泪痕

第三章 隆被逐出艺术之门

十四 童真的“小夜曲”

十五 “辨杖须待七年期”

十六 勒令退学的威胁

第四章 少女的痴情

十七 青纱帐里的邂逅

十八 第一次嫉妒

十九 玫瑰色的异彩和褪化

第五章 真诚而幼稚的错误

二十 “革命造反队”的一员小将

二十一 她疲倦了

第六章 夫妻的分手

二十二 不成婚，何必成仇

二十三 地中海滨的倾诉

二十四 分手的时刻

二十五 给儿子留下什么？

第七章 “送你一根棵忘草”

二十六 临别前的歌声

二十七 最好的观众

第八章 敲开另一扇门

二十八 另一个世界的歌声

二十九 孤独的选择

三十 再一次起飞

第九章 成功者的眼泪

三十一 面对新大陆

三十二 院长的迷惑和她的眼泪

三十三 夜与昼——不息的奋斗

- 三十四 A⁺——我应得的
- 第十章 “回娘家”
- 三十五 迟到的奖赏
- 三十六 相聚在北京
- 三十七 艺术家之梦
- 第十一章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 三十八 “为了革命”
- 三十九 一个女人的梦
- 第十二章 另一个乐章的开始

“裸野”和它的主人……………李世琦（145）

- 一 “国际羊群”的缔造者
- 二 在疯狂的岁月里
- 三 回澜阁忆往
- 四 青春，在荒原闪光
- 五 “没穿衣服的野人”
- 六 “一定要把钟撞响”
- 七 花甲七品芝麻官
- 八 “我”，就是我

第十八个与走进门槛的少女……杨羽仪（209）

- 一 “门槛”的梦
- 二 第十八个
- 三 泥塑的回忆
- 四 夜泊珠江
- 五 相煎何急
- 六 夜来风雨声
- 七 冬夜，也有一点温暖
- 八 被绑架的蛋形学生
- 九 漓江父母

- 十 “山鬼”
- 十一 北上列车
- 十二 肃穆的紫禁城
- 十三 少女走进了“门槛”
- 十四 鸽子飞去
- 十五 负债的心灵

凝聚着希望的梦……………张同吾（272）

来自炼狱的朝圣者

梁 南

一 浮不起来的朝圣者

1957年整风期间，从左派到“右派”的演化过程，几乎没有量变，只有质变。数以十万计的文弱书生，说过几句话，写过点文章，提过些意见，尽管语含针砭之效，文章与意见多富匡时救弊之见，一些人还是头疼皱眉，心神不安，认为要搞政变，立刻判为恶毒污蔑、猖狂进攻，把这些人一夜之间入选“右派”。

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说文雅点是“戴荆冠”或“在劫难逃”，最通俗的术语是“右派”，好象“右派”是一种上司任命的职务，是受封讨来的，不许辞职，不许“挂冠”，基层群众流行的称呼是“老右”，贬意甚明，故只在背后戳脊梁骨议论时用之。全称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摘帽”则彼此雅称免冠，内部文件却有创造性的辞头：摘帽“右派”。意思毫不含糊：摘不摘帽，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右派”，骨子里都是“右”。我们这些经受炼狱磨练的人，本想当青蛙，却被定为永远摆脱不掉尾巴的蝌蚪，多年劳顿辛酸之苦，虔诚可鉴之望，化为灰烬，变来变去还是“右

派”，能不伤感落泪者几人？！有个敢说敢闹的人，思想拧不过弯来，到处发感慨说：“按照这个逻辑推论，被开除党籍的人就该称为‘除名党员’或‘开除党籍的党员’喽，有这样称呼的吗？”大家以为言之有理，呼请正名。但正名的事一枕黄粱，摘帽“右派”仍然叫摘帽“右派”，一直沿用不衰。

其实，“右派”只是一个笼统的总体概念，细分起来还有五个层次，轻重有差，待遇不同，局外人未必尽知其详，五个层次是：一类“右派”劳动教养，已厕身犯人之数；二类“右派”内部文件划入“极右”（我是二类，在改正时，方知自己属于此类），未投入劳教，但职级一撸到底，每月只发生活费28元；三、四、五类则保持一定干部工资待遇。此外还有“中右”，材料装入档案，视其表现，控制使用，本人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

固然有戴上帽子后感到无面见江东父老，或不胜其压力而颓然倒下，乃至寻短见自尽的，我也偷偷买来耗子药和烈酒，准备告别地球，后来才回心转意，决意“要活着证明自己不是右派。”然绝大多数戴着帽子的人，完全象殉道士那样，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戴罪立功”，拼命往死里干，务求帽子之急去者，是想伸伸头颅，换换尴尬处境，增加点经济收入。我不例外，只多一条：渴望取得发表作品的资格，以求他日炼成正果。

炼成正果的起步是摘帽子。摘帽子须靠近组织，劳动改造出色，证明确有悔改表现，才能求得宽大处理，放归普通人圈子（实际上当然还是“内外有别”）。劳动怎么个出色法？起码得兼有力气与技巧，我两者皆很低能，所以对我难度最大。

一是身体素质差，干活不在行，在“右派”群中不显不露，属于末等劳力；谈到靠近组织，多指随时随地将“右派”群中的新动向汇总上报，这种功底我更逊色。所以，必须死咬牙关，含辛茹苦，坚韧不拔地去干。出工时笨鸟先飞，打头出发，争取不落人后；收工时甘愿迟走几步，再干几下。对分配到头上的差遣，一语即诺，不讲价钱。1958年冬季，命我将养猪的差使移交

给《大公报》来的女记者高芬，抽调我到第一线打冻层开河道，那是一等劳力的重活，我二话没说，立即回去打点行李。养猪看起来自在，其实极苦，统管九十多头仔猪，一大早需挑七担水熬猪食，柴禾饲料又不是现成的，每天得三次肩挑七八十斤猪食来回走三里地，外加放猪，清扫猪舍，高芬这个纤弱女子是吃不消的。我明知其不能但不敢说，否则会误以为我恋栈，视为对抗组织调动。那种时候，一个人一句话，都是可以代表完整的集体组织的。

1958年是寒潮猛袭北大荒的年代，十冬腊月，天气冷到零下三四十度。我们在大草甸子的腹部开辟排涝河道，几百人过着比苦行僧还要苦行僧的生活。除队部伙房合用一顶破帆布篷帐外，其他人马全部露宿草甸子。我那时尚无褥子，只有一方拉萨买的意大利太阳牌毛毯，毛毯底下胡乱絮些茅草，便算筑好栖息之巢。我穿的是空军发的短筒皮靴，鞋头高翘，褶皱深凹，破晓起身后，发现冻得卷起来，象两锭元宝，脚怎么也伸不进去。开饭哨随朔风火急火燎传来，越是急躁越是用，直到双脚的热气将褶皱软化，勉强强才穿上脚，伙房早打烊了。为完善我“笨鸟先飞”的心计，当夜我便穿鞋入被，头戴狐皮帽子，靠脚那头用麻绳结死被子，蒙头盖脸而卧，利用呼吸的微热在被子里充暖。每天晨起，被面的霜花都有半公分厚，我却省出穿衣戴帽的时间，领先一步搞其他杂务。

我们就是如此虔诚地视摘帽如朝圣麦加耶鲁撒冷，野性尽收，谨言慎行，沉头弯腰，唯命是听，分寸不敢逾越，这是那时“右派”普遍的精神状态。

那时，“放卫星”、“拔白旗”之风全国风靡，报纸广播当成经验啧啧推荐。我们这些体弱的“右派”一律编入“白旗班”，以免拖人后腿，每到星期三、六放“卫星”之日，给每班下达的指标，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定额，每人约六七方土，劳动强度之大，平生仅见。孔武强悍的尖子班仅能略为提前完成，可以偷

闲倒在雪地上打个盹，“白旗班”往往旧债未了，新债又起，我们有三次连续三天三宿没完成一个昼夜的指标，于是，全队集合让我们站出来“亮相”，差点没给每人背上插一面白旗。“白旗班”的班长，是文化部下放来的赵君，他看一个个病秧子精疲力竭、不堪其苦的窘像，于心不忍，担着风险让每个人轮流在灌木林里眯两个小时，我是深更半夜听着悲凄的狼嚎入睡的。

为此我黄皮寡瘦，形象可怖，但自己看不见。那时，我们这些人全都失去了对美的敏感，除外交部来的一个什么司长外，我不记得有任何“对镜自怜”的人。另外，取水的艰难不亚于大戈壁，抬一大筐雪只不过化浅浅一盆水，于是洗脸水从免，刷牙洗脚也相应取消。伸手到被子外抓把雪花，揉搓几下，就端起盆子嚼大楂子，我牙功不济，啃到最后总有半盆冻成冰粒。严酷的磨洗使我体枯形毁，却执著劬劳在荒原上。脸上有麻瘢的朱指导员敏锐地觉察到我惊人的变化。有天下午，他吆喝住往回返的马车，派人帮我收拾行李，让我回后方基地，我以为有什么过失被斥退，感到委屈，坚不上车，他招呼两个人架我上车，严肃地说：这是命令！不知是感激还是难过，两珠泪水滴嗒而出。

到后方基地，我远远望见了老太婆式的高芬，不禁全身颤栗，不到半年，高芬竟走过三十年苍老的历程！高芬是五十年代与《人民日报》金凤齐名的两个著名女记者，来边境时四十岁出头，可面貌端丽如少女。如今她容貌灰黯，背脊佝偻，老态毕露。我突然体味到，劳动强度超过体力所能承受的限度时，残酷的摧毁力，对任何人都是无情的。高芬也怪异地望着我，吃惊得张口愕然。历史就是这样在严酷磨洗我们，而我们还觉得自己是有罪的。

从1958年4月23日起，我就背着苦难的十字架，走过炼狱、坟茔、死巷，走过荆棘蒺藜编织的无路之路，以风雪为衣，以炎阳为裳，象叩求十方的化缘僧，头碰崎岖，脚踩坎坷，虔诚到1961年12月26日，基督诞生的日子，农场的分场举行“思想丰收

大会”，终被免冠，取得了发表作品的资格。蛹子一朝美丽成蝴蝶后就想飞了。我渴望我的诗美丽成蝴蝶。

我写诗纯属技痒，流放到边境来后，为避人耳目，不敢公然分行抄在本子上，每有所感，便一句接一句实录下来，以备他日润色之。现在我可以一篇一篇陆续寄出去了，结果一篇一篇陆续退回来，虽然退稿信写得很客气。我看出个中原因：一是不能适应气候，缺乏民歌风；二是政治身分使人为难。一言以蔽之，摘帽“右派”也是“右派”，发表这些人的作品，编辑要担风险，“左派”的作品挤不上去，亦会横加指责，故燕祥、公刘等人的作品，都是偶一见之。明乎此，我本应洗手，却不甘心。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冠既已免而草稿麇集于册，便援引国务院发表于《作家通讯》不另行文的通知，于1962年3月向所在地黑龙江省文联领导写信，恳给创作假三月整理积压的旧作，文联致函我所属的八五〇农场商榷，农场政治部秘书张开平竭力支持，反复与我劳动的林场交涉，让我带着信去觐见林场田书记。田书记是长征干部，老资格，持有“特供”本本，我去拜望时，他躺在床上与我对答，语无伦次，又不知作家协会为何物，但碍于上司的催促不便拒绝，吞吞吐吐答应让我八九十个月搞创作，附加条件是：“假是给你，一天不准超过，在此期间不许外出活动。”我唯唯而退。

我寄稿的刊物是《诗刊》和《人民文学》。《诗刊》创刊伊始，曾请燕祥、公刘、闻捷、孙静轩及我五位青年诗人聚餐，并向我们约稿，应该是有缘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则是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推荐人。几经碰壁，《诗刊》才通知我暂留《向日葵》一诗备用（最后未用）；《人民文学》通知我，将于1962年10月同期发表我的长诗《白玛》及短诗《上山》。可以认为，久违的名字变成铅字是一种公开的评价，它向人们传递信息的意义（诗人梁南仍然存在），远远超出发表作品本身的意义。我在煤油灯下悉心展读这些信札，被囚禁的灵魂仿佛得到开脱，闯荡出抑郁之

门，创作情绪掘开了新井，笔头重新流动着对生活的美感认识，不写便坐立不安。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觉得在特异的环境里，垦殖者灵魂得到焚冶及命运分娩出的悲剧美，我不道之，谁能道之？历史的磨洗不能忘却。

我们开始痛苦的欢笑时，政策杠杆在进行新调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向来是被赞美的蓝本。每次变动，坐交椅者虽偶亦触动，但为数甚少。深受其苦的，往往是下里巴人，或戴着形形色色帽子低头卖命的人，尤其是我辈中人。就象赤裸全身从泥土深处拱出地表的蚯蚓，我们这些朝圣者，刚盼到细雨之来，惊雷迅即劈到头上。位忝五类分子之末的“右派”，自是锋芒之所指。一批摘帽“右派”诗人突然出现片刻又突然销声匿迹。1962年8、9月之交，我亦收到《人民文学》一封耐人寻味的信函，传达的就是这种不祥之兆，大体内容是：由于某种你所知道的原因，已经上版的长诗《白玛》及短诗《上山》，不得已而割爱，望能得到你的理解。措辞谨慎，语气平缓，而且，再三道歉。原稿的题目、署名及内文均用红笔标上发排字号，油墨斑斑可见，编辑是无力左右局面的。大家都是斗争的供品，刊物、编辑和作者，甚至也包括读者，这是无庸讳言也是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

信函僵滞在手上，满脑子染入苦闷。作品不能发表的背后，注释着一大堆逻辑命题。我被一拳头推向十字路口，象破产者望着毁灭的家底。别无选择，只好如孔子获麟而绝笔了，对于一个受难的诗人来说，只顾耕耘，不问收获，是不堪忍受的。当夜我对着怒放的灯花解不开这个谜：我们多年来曾怎样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通盘来考虑问题，曾怎样原谅过许多不该被原谅的东西，我们是一生只为人塑像，而从来不敢奢望当主教的人，是手里只握劳动工具而无匕首的人，我们是从冷漠、告诫、训斥、轻蔑的境地里爬出来的，我们爬得老实本分，却处处不被人放心，必欲驱之死谷而后快，夫复何言！

然而，我有我的价值，不准我结果子并非我不会结果子。我

把信件向许多人传看，其中自然包括《枯鱼过河泣》里鱼干嘱咐的“相教慎出入”的用意，发出北京来的警告。有的叹息，有的愤懑，有的无言。基层最是蛰伏好人的场所，我也总是在欲投江时遇上耿正的渔夫。省农垦局文工团搞创作的史方同志一见此信，黯然将诗稿索去，利用他优越的地位，转换手法向各刊物转投均遭碰壁，其后，我们相隔遥远，我的地址流动无常，作品无法还我，其间历经抄家焚书的十年喧嚣，在他手头保存二十年，竟一字无损，1982年壁还时，我才得知详情。

我处在“长恨此身非所有”的境况下，“浮”既浮不起来，沉又不愿自沉，便抱定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态度，继续整理旧作，舍不得搁笔。

位于崇山峻岭间的林场秋季来得最迟，十月也已秋色浓郁了。山区的秋季是黄金时节，蘑菇木耳榛子核桃猴头猕猴桃，带着各自的光泽，丰沛着人家的提篮屋顶门前。我们这些人平素乐趣甚少，没有任何业余嗜好，拣山货则是行家，盖可以自寻一点欢乐来解苦，故鲜货干货到处铺陈，个个丰收。我掏尽鼻孔里的一砣一砣油烟屑后，终于化为二百篇整理好的作品，在精神上也是丰收。这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致函农场政治部，建议我把作品送哈尔滨审阅。我去政治部找秘书张开平，他浏览了我带去的一些短章，表示赞赏，并立即给林场写信，同意给我一个月时间去省城一趟。这是沉中有浮的一段插曲。此时林场冬闲无事，资金匮乏，便向朗乡林业局出口劳力。我返回林场时全队都在整装待发，让我这个劳力也随队前往，干一段时间再转赴省会。

到朗乡后分配我们打样子，木头需由自家去林间搜集，需组成小组，兼管运、劈两道工序。有人愿结合我，我自知力气单薄，怕剥削他人劳动，就一人单干。运木头的爬犁是照葫芦画瓢按他人样式做的。别人每月能挣一、二百元，我连四十八元的工资都挣不出来，仅够糊口。到哈尔滨送审作品时，身上一文不名。住了五天一元二角一天的黑龙江旅舍，再也支付不起住宿